

《三国演义》在美国的学术讨论

——《三国演义 与中国文化》述评

骆海辉 王海燕

【摘要】 美国学者金葆莉与董保中主编的《三国演义 与中国文化》是第一部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英文专著,集中反映了美洲的“三国”研究成就,证明了基于不同学科视野进行“三国”研究的可能性,丰富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文献资料,也为中国研究者带来了西方文论的关照视野和西方文学的评论角度,构建了中外学者跨地域交流的学术平台,但是它的不足在于遗漏了《三国演义》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 《三国演义 与中国文化》;学术价值;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6-0150-6

一、《三国演义 与中国文化》简介

美国缅因州科比学院金葆莉(Kimberly Ann Besio)博士与布发洛纽约州立大学华裔学者董保中(Constantine Tung)教授合编的《三国演义 与中国文化》(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作为夏威夷大学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一,于2007年3月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立即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好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马兰安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008年第2期、美国乔治亚大学的Siyuan Liu在《亚洲戏剧学报》(Asian Theatre Journal)2008年第2期、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Qianchen Li在《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9年第4期相继发表了书评。马兰安博士认为它“不仅弥补了西方读者在《三国演义》研究资料上的不足,而且开启了‘三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1] Siyuan Liu认为“这部专论《三国演义》的文学与哲学蕴义、讨论大众娱乐形式如何受其影响的专著,对于汉学及中国戏剧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XBZX0914)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骆海辉,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海燕,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 绵阳 621000。

研究都是有益的补充。……是一部对专家学者与在校学生都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2] Qianchen Li指出,“虽然西方学者在过去30年里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兴趣与日俱增,但在这一充满生机的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及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全译本却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无论是对中国小说文学的总体研究,还是对《三国演义》小说文本的个体研究,这都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论著。”^[3]

二、《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这部专著是2001年在四川举行的“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英语论文集。除序言以外共收录论文11篇,展现了不同国籍的学者在现代跨学科视野下对《三国演义》小说与中国文化的不同领悟。

第一部分“《三国演义》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属于基础研究。董保中的《上天注定与人之义务:三国演义的悲剧意识》和张错(Dominic Cheung)的《遗恨的本质:三国演义的悲剧意识架构》两篇论文探讨了小说的悲剧因素。董保中认为小说取材于历史,具有史诗般的壮丽色彩,却又重构了一个伦理与道德的悲剧性艺术境界,上天为每一位英雄肩负的道德义务都预置了政治条件,犹如一个又一个的陷阱难以企及。小说中的英雄又都试图以个人的意愿违抗天命,因此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悲情英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悲剧性的性格缺陷,而是因为他们明知天命难违却又拒绝妥协。张错也有类似的想法:历史的兴衰是不可避免的循环——这种发展态势正是小说力图展现的主题,即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汉朝暴政的衰败为大小诸侯提供了成为英雄的机会,而各路豪杰却又不得不在志在必得的努力与注定失败的命运中抗争,从而生动地构建了小说的张力。余纪元的《三国演义中的“义”》,讨论了“义”在小说和早期儒家经典中的哲学意义。作者断言,在儒家道德理想逐渐地被大众化、被

灌输到个人道德生活及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三国演义》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所以,解读小说的“义”将有助于理解“义”如何从最初的儒家哲学概念到后来被当作了道德的标准。作者的结论是,小说中包含的儒家道德思想揭示了一个问题:由于儒家哲学并没有严格地定义什么是“义”,因而人们很难明白应该如何做到有“义”,也没有哪一种行为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而小说的叙事却恰恰表明了儒家思想才真正把握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罗慕士、董保中、张错和余纪元都认为“义”是两难的,但也正因为对“义”的坚持与执着,《三国演义》才能如此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这种复杂性。

第二部分“《三国演义》与中国历史”阐述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丹(George A. Hayden)的《汉代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开端》,对比分析了历史文献中有关预兆、应验和皇帝决策的记载与小说作者根据需要而有选择地使用文献的情况,认为小说表现了人类在自由与命运的复杂选择中,上天对人的意愿不仅有警示,而且也有应验性的实证。这与第一部分论文的结论遥相呼应。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的《三国演义的史料选择:关于司马光与陈亮重构孔明故事的思考》考察了历史文献为构建诸葛亮在小说中的形象而起到的作用。虽然小说将诸葛亮刻画成了杰出的谋略家和军事统帅,但总体上讲,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对诸葛亮的积极评价中还包括了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批判。田浩认为,是宋朝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与陈亮(1143-1194)两人推动了诸葛亮形象的变化:《资治通鉴》对孔明的功绩作了突出叙述,陈亮的《酌古论》更将孔明比为“圣贤”,两者对罗贯中的创作提供了启示。诸葛亮角色形象的转换体现了价值观念变化的复杂性,而这一结论也恰恰证明了罗慕士在序言中所言“阅读《三国演义》可以研究冲突中的价值观念”是多么富有思想的判断。

第三部分“《三国演义》与中国戏剧、艺术作品”表明,以《三国演义》为切入点去研究中国视

觉与表演艺术史,可以获得更加深刻的见识。视觉与表演艺术作为传播媒介,在文盲群体中有效地传播了《三国演义》的人物与故事。尽管小说文本只有识文断字的人才能阅读,但三国故事却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鸣。金葆莉的《博望烧屯的两个杂剧版本比较》发现,杂剧《博望烧屯》的元刊本重在刻画诸葛亮本人,而明抄本却重在表现诸葛亮与张飞的矛盾冲突。作者认为,这些变化表明有关男性品质的认识向着更正统的儒家思想的变化,一方面显示了杂剧形式和功能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显示出观众审美眼光的改变。潘凯琳(Catherine Ragani)的《中国年画的三国主题》考察了在中国十分流行的木刻年画中的三国主题。虽然如Siyuan Liu指出的一样,由于潘凯琳缺乏足够的中国戏剧知识,所以她在个别地方误读了年画中人物的身份。但是她的研究却发现,《三国演义》与流行的戏剧和视觉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通常是(视觉艺术形式之一的)年画的理想主题。年画设计中采用了戏剧的人物风格、舞台背景、服饰脸谱,说明年画的人物形象主要源于三国戏剧,即取材于小说且在舞台上表演的故事,而不是小说本身。魏莉莎(Elizabeth Wichmann-Walczak)的《二十一世纪曙光下的三国演义:上海京剧团的京剧曹操与杨修赏析》则认为,这部1988年初次登台演出的现代京剧以小说中迷人的片段为基础,为中国和世界的观众创造出了无价之宝。文章探讨了该剧取得商业成功并获得广泛好评的原因,阐明了当下将小说素材与京剧艺术完美结合的可能性。文章证明,《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构建中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部分“《三国演义》在当代东亚地区的传播研究”探讨了《三国演义》的现代意义,分析了小说跨越历史长河、超越中国本土的域外影响。洪俊浩(Junhao Hong)的《三国演义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得失与启示》指出,根据小说改编的84集电视剧在全世界的观众达到了12亿!作者讨论了电视剧成功的诸种原因,而电视剧出版与发行

的数据则证明了电视在传播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除了作者列举的“得失”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国人物与故事虽然长久不衰,但受众对其蕴义的解读却是不断变化的。金贞嬉(Jinhee Kim)的《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接受与地位》运用读者接受与反应理论,以第一手资料说明了《三国演义》在韩国的广泛影响,证明了小说具有极高的通俗性与延展性。近现代在韩国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很多,但在小说文本穿越民族文化的旅行中,韩国受众却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像作者一样积极主动,以有效的阅读跨越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既了解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又获得了强烈的认同感。中国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的《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描述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充满蓬勃生机的《三国演义》研究势头。作者学识渊博,对全球的《三国演义》研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指明了方向,即以深化版本研究为基础,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大力推进数字化过程,加强中外学术交流,而重中之重乃是从总体上重视《三国演义》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沈教授的论文由金葆莉译为英语,并作为最恰当的结束语置于论文集的最后一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演义》的第二个英语全译本的译者、纽约大学东亚研究院罗慕士(Moss Roberts, 1937—)博士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明代小说《三国演义》语言中的价值观”——也是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在全书中起到了定调的作用。作者指出,阅读《三国演义》可以研究冲突中的各种价值观念,如“义”与“忠”、“孝”与“兄弟”。在小说的叙事中,刘备重视兄弟间的“义”,孔明重视的却是君臣间的“忠”和父子间的“孝”。金葆莉认为罗慕士的序言是优美的小说鉴赏,敏锐地总结了赋予小说鲜活生命的各种价值观及其冲突,为论文集增添了光彩。

三、《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不足

比较研究异域学者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与

文化的认识与解读,将有利于我们在异域与现代跨学科的视野之下,建立起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本身及其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审美积累,从而更深刻地领略到蕴涵在小说字里行间的独特中华智慧,进而理解《三国演义》何以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最深刻的民族记忆。因此,这部《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因为鲜明的异域与跨学科特色而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首先,它集中反映了美洲的“三国”研究成就。根据沈伯俊教授的研究,《三国演义》及三国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以中国为中心向域外辐射的态势,而域外的三国研究活动又基于三个活动圈:核心圈为日本和韩国,是国际“三国热”的中心;第二圈有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第三圈则包括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西方的《三国演义》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有俄罗斯的李福清(Boris Riftin,1932—)教授,英国的魏安(Andrew West,1960—)博士,法国的苏尔梦(Ms. Claudine Salmon)女士和澳大利亚的马兰安(Anne Elizabeth McLaren)博士。单就美国的《三国》研究而言,虽然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教授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由三联书店于2006年出版)对《三国演义》也有独到的论述,但“美国过去似乎没有着重研究《三国》的学者”^[4]。然而,这部《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却证明了美国的《三国》研究在21世纪的异军突起:它是国内外的第一部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英文专著,首次集中展示了美国学界的《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从而填补了《三国演义》研究在美洲的学术空白,也标志着《三国演义》研究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的学术讨论。

第二,它证明了基于不同学科视野进行“三国”研究的可能性。本书收录的论文反映了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史、戏剧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通过相关的描述、分析与讨论,以广泛的研究主题全面地探讨了《三国演

义》与中国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三国演义》从古至今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个人行为、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乃至语言使用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不仅证明了《三国演义》是一部经世不衰的世界文学名著,而且证明了小说可以置于不同的学科视野下加以研究。因此,它不仅丰富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文献资料,而且也为中国研究者带来了西方文论的关照视野和西方文学的评论角度。例如,赵云在长坂之役血染征袍,孤军奋战,救出了刘备之子阿斗。罗慕士在本书的序言里引用了这个著名的片段来分析“忠”与“义”的冲突,阐释“大义灭亲”的意义。小说写到,玄德接过(阿斗),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5]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也有记载曰:“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6]罗慕士认为,刘备把(或假装把)亲生儿子扔在地上,可能是在效仿汉高祖刘邦。虽然作为三军统帅的刘备与刘邦,当众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实为大义灭亲之举,但在小说文本解读与批判中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刘备与刘邦为何要抛弃自己的骨肉?希腊传说中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为何要牺牲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ia)?而圣经故事中被尊为美德典范的亚伯拉罕(Abraham)又为何愿意牺牲嫡子以撒(Isaac)来表明自己对主的忠诚?罗慕士指出,这些例证说明了他们的大义灭亲之举,既可鼓舞追随者的士气,又可以非凡的自我否定维护他们的领导地位。

第三,它构建了中外学者跨地域交流的学术平台。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国际化,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不仅重要而且日益频繁。这部专著的平台作用在于,一方面,专著本身就是不同国籍学者交流智慧的产物。十余位作者,或是美国本土的汉学家,或是活跃在美国学界的他国学者,或是中国专家,都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专长。金葆莉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缅因州科比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专家,研究兴趣是中国传统小说与戏剧、古代中国的性别建构。魏

莉莎是夏威夷大学亚洲戏剧系教授,对京剧的起源与发展、京剧美学颇有研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位外籍荣誉教授,也是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苏分会、上海分会的外籍会员,还是在中国大陆表演京剧的第一个外国人。……虽然我们无法在此详述所有作者的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都对《三国演义》乃至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共同的兴趣与关注,而且他们“在资料占有,理论视野,方法运用等方面确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7],因而在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度涉及中能够以在长期学术实践中养成的研究素养提出跨学科视野下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研读这些论文就等于是在与大洋彼岸的学者交流思想,有助于解读他们有关《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认识与见解,更有助于我们在交流中反思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为了方便读者,本书专设一章(第179页至第181页)将所有论文作者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及学术成就等详加介绍,这就与我们某些论文集简单地堆积文章的模式有所不同。再如,本书在排列参考文献时,将汉语拼音与繁体字合用,如第173页的“Rong, Fan榮繁:‘Cao Cao, yige zhenshi de fuza renwu曹操,一個真實的複雜人物。’Dazhong dianshi 2 (1995):68。”——这一实践则告诉我们,并非只有将论文所有文字都用外语(或曰中式外语)翻译出来才符合所谓的“国际学术惯例”。

但是,纵览全书,本书最大的缺憾是忽略了《三国演义》的翻译研究。

在《三国演义》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翻译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湖南文山在1689-1692年间翻译的《三国演义》日文全译本算起,《三国演义》的外文翻译可谓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至今外文译文已有近二十个语种^[8]。其中,《三国演义》的英语译文包括片段译文,如汤姆斯(P.P. Thomas)1820年翻译的《著名丞相董卓之死》;也包括节译本,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1981年翻译的《三部古典小说节选》(Excerpts from Thre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和加拿大张亦文(Cheung Yik-

man)1985年翻译的《三国志演义》,翻译的都是《三国演义》的第四十三回至五十回;还包括两个全译本:第一个是San Kuo,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由曾在福建船政学堂担任驾驶教习的英国人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1857-1938)翻译,分为两卷,1925年由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imited)出版。邓罗的《三国演义》译本首次完成了小说文本在英语世界的全面再现,使《三国演义》这部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从此得以穿越时空开始了在英语世界的文本旅行。《三国演义》的第二个英语全译本是罗慕士翻译的Three Kingdoms,199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在美国出版;1994年由外文出版社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罗译本以详尽的译者注释为《三国演义》研究从地域性话题走向全球性话题提供了阅读与批评的文本,在美国学生、华侨、华裔及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外学者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反响^[9]。借用沈伯俊教授的评价来概括,罗译本“对《三国演义》在美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10]。很显然,在中国小说西译的背景下,英语译本及其他语言译本成为了译入语文化的人民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促进了这部高度浓缩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文学名著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在场,帮助了译本读者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消费。所以,这些译本不仅是翻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而且也应当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文献。

《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文军、李培甲(2011)的统计,从1982年至2010年,国内共计发表了68篇《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论文^[11],而研究实践表明,《三国演义》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可以丰富《三国演义》研究。例如,以霍姆斯(J. Holmes)的“描写翻译研究”为视角来审视,产品研究(即对《三国演义》个别译本的描述与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并为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找到具有示范价值的经验;过程研

究(即回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但又多多少少与原文吻合的译文等问题),将有助于满足我们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关注;而功能研究(即描写译本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不同的《三国演义》译本在何时、何地、被谁翻译?原因何在?影响翻译作品的因素是什么?……因而,这部《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又是研读罗慕士译本的实用参考书,罗慕士的序言及有关小说的几篇基础性论文,都是实用的参考资料。罗慕士对《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小说语言价值的判断,是决定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其他作者的文本解读与个体观点则为译本的普

通读者提供了批判性启示,尤其有助于译本英语读者对《三国演义》的深度阅读和了解小说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为国内的《三国演义》小说研究与三国文化研究带来的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为我们拓展研究空间带来的有益启示:在当下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与学科交叉的学术趋势下,只有《三国演义》小说文本的解读,或者只有中国学者参与的研究,都难以称为完整的三国研究。因此,将《三国演义》研究从文本解读发展到了三国文化研究、《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等纵深领域,才是研究的深入与方法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Anne Elizabeth McLaren. A Book Review on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ssue 2; pp383).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 Siyuan Liu. A Book Review on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Asian Theatre Journal, Volume 25, Number 2, Fall 2008. pp390-392.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 Qianchen Li. A Book Review on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68, Issue 4, pp1242-1243).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 沈伯俊.国际汉学热中的《三国演义》研究——答马来西亚《三国演义》记者问[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 [5] 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春出版社,2006
- [6]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865341.htm[EB].
- [7] 沈伯俊.一九九七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J].天府新论,1998,(3).
- [8] 王丽娜、杜维沫.《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6,(4).
- [9] 骆海辉.论典籍英译的译者素质——罗慕士个案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1).
- [10] 文军、李培甲.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评述与建议[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8).

(责任编辑 彭东焕)